

考证与阐释：江户时期《左传》研究的新视域

——以龟井昭阳《左传纘考》为中心

毛振华

【摘要】《左传》的日本传播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江户时期，《左传》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汉宋之争中滋养着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龟井昭阳对“周孔之教”推崇备至，其《左传纘考》把《左传》尊为孔门遗典，而对《公羊传》《穀梁传》《孟子》《荀子》却采取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昭阳批判性继承杜预注，善于引用与《左传》同时期的古文、古注，并博采众说加以考辨，同时注重贯通《左传》全书、探寻总结行文规律进行注释，不仅追求详尽，而且还着意于精细的考辨阐释和“文例”“义例”等的分析，突破了徂徕学派“以识古文辞为先”的局限，把形成于宽政年间的考据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以南冥、昭阳为代表的龟井派是江户时期反对朱子学最强劲的一支力量，昭阳在继承乾嘉学派谨严考据之风的同时，又注重义理之辨，表现出了鲜明的阐释学观点及一定的经世致用思想，代表了江户《左传》学的日渐成熟与日本汉学的基本成型，进一步促进了日本文化对《左传》的研究、继承与传播。

【关键词】江户汉学；龟井昭阳；《左传》；考据学；阐释

【作者简介】毛振华，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杭州 310023）。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3.2.69～7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左传》学史”（17BZW081）。

《左传》是最早传入日本的汉籍之一。据《日本书记》所载，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国王派五经博士段杨尔携带《春秋》等赴日。继体天皇十年，高丽五经博士高安茂携《左传》等到日本讲学。^①《宪法十七条》便有援引《左传·文公六年》“以私害公非忠也”，《左传·成公十六年》“上下和睦”等内容。^②自平安时代以来，日本学者逐渐开始学习研究《左传》，江户时代推崇儒学，伴随着清代考据学著作的不断传入，日本《左传》研究日益兴盛，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江户《左传》学。然而与学者们对江户《诗经》《论语》《楚辞》等的研究盛况相比，江户《左传》学的研究显得较为寂寥。严绍璁《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牧野谦次郎《日本漢學史》（世界堂

書店、1938年），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学史》（富山房、1939年），岡田正之《日本漢文學史》增訂版（吉川弘文館、1996年）等论及代表性学派的《左传》学成就，多是一笔带过。内野熊一郎《日本古代（上代より平安初期）經學書の研究》（『東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紀要』第二号、1955年6月），连清吉《日本江户时代的考证学家及其学问》（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上野賢知《春秋左氏傳雜考》（東洋文化研究所、1926年）等对日本上代至平安初期、江户时期代表性学派的《左传》学成就加以评述，总体上也较为简略。相关个案研究多集中在《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及《左氏会箋》与《左传纘考》的比较研究上。对于江户《左传》阐释学方法、学术地位及在江户汉学的价值与影响等方面的探究还有待深入。

江户《左传》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从其学术传承及学术主张上看,可以分为以林罗山、林恕等为代表的朱子学派,所著《春秋劈头论》《左传序考》等排比诸家观点后作简要评介,但并不拘泥于朱子学家的观点;以伊藤东涯为代表的古义学派反对朱子学,所著《左氏熟语》《论易礼春秋传教学之旨》等批判宋明理学空谈性理,主张以古文辞求古义;以荻生徂徕、龟井南冥为代表的古文辞学派倡导把古文辞作为解经的重要方法,所著《左传古义》《春秋说》《春秋左传考义》等继承并发扬汉代的朴学传统,引征文献每每推崇六经及西汉前之文章为“古文辞”;以大田锦城、海保渔村、安井息轩为代表的考证学派身处江户后期,深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所著《左氏纠谬》《左传杜解纰缪》《左传集注》《左传补证》《左传辑释》等长于经术,密于考据,希冀以此来还原经典之真谛。处于江户后期的龟井昭阳(1773-1836)深受江户各派学风、清代考据学等成就的浸润影响,传承并发扬其父龟井南冥(1743-1814)的学术精神与学术主张,博通经史,“以学问渊博,经术湛滨见称”,^③著有《左传纰考》三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毛诗考》二十六卷《附录》一卷、《礼记抄说》十四卷、《论语语由述志》十卷等,尤以《左传纰考》用力最深,在江户汉学、清代考据学影响下,彰显其鲜明的经典主张,显现出史料考证与文本阐释相结合的鲜明特色,“算得上是龟井昭阳最得意的经典注解了”。^④

一、龟井昭阳推崇《左传》的经典观

龟井昭阳推崇《左传》的经典观,主要是围绕着推崇孔教的立言宗旨展开,其研究以对《左传》的解读为基础,对“周孔之教”推崇备至,把《左传》放在与《论语》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与《公羊传》《穀梁传》《孟子》《荀子》相比,《左传》具有恒久的典范性与权威性。他对《左传》经典地位的维护是以注重史实与义理之辨为前提的,其义理之辨是站在客观史实基础上,对相关材料的充满理性的思考和阐释,从而客观呈现出《左传》独有的地位与价值。

(一)推崇《左传》为孔门遗典

昭阳推崇《左传》,并从孔门遗典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和注解。《左传纰考·总论》:“唯左氏之论人论事合符《论语》,而绝不似孟子,所以为孔门遗典也。”^⑤其《家学小言》:“《春秋》之义,《左传》与孔门合。不可他求”,“宜稽之孔门,以知《左传》之为古义焉”。^⑥如《隐公元年经》曰:“元年,春,王正月。”昭阳认为:“正月系王,而一统之义见矣”,“元年必书正月,而谨始之义见矣”。^⑦案,杜预注曰:“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左传》在尊崇君王、维护周礼、尊礼尚德等方面与《论语》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又如《襄公三十年传》曰:“卿不书,不信也夫。”昭阳认为:“孔门之教主忠信,左氏示春秋之义符合如此。”^⑧案,其全文曰:“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蚘、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会于澶渊。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不信之谓也。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左传》围绕忠信之义展开论述,表达了对诸位卿大夫不信不义的批判,与孔子主忠信的理念一致,因此昭阳常慨叹:“此孔门之真面目也。”^⑨

(二)批驳孟荀非孔子意

与《左传》相比,昭阳对《孟子》《荀子》采取排斥态度,他认为:“孟荀之说非孔门意”,^⑩“左氏之议论出于孔门,大非孟荀儒说之比”。^⑪在此基础上,他比《左传》与《孟子》《荀子》,一反之前对记录鬼神之事的批判,而是从《左传》“具录而不削”“实录以表世态”等层面肯定其学风,同时批判孟荀之论。“鬼神、卜筮之事,左氏具录而不削,乃为实录以表世态之故也。人见其所之实,而谓左氏溺鬼巫,狂也。隐十一年所记‘邪而诅之,将何益矣!’哀十八年所书‘惠王知志’,皆举君子之语。皆乃驳正其时鬼卜之说。左

氏为书,非在孟荀儒家之伦也”。^⑫如《成公八年传》曰:“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昭阳认为:“上文言‘汶阳之田’,下文曰‘归诸齐’,此言谓曰三字之定法也。经书之外,唯《左传》灵光岿然,孟荀既变况,《公》《穀》溃然以错,此《左传》出自孔门而不与孟荀伍之一大明征也。”^⑬案,《孟子》曰:“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孟子·告子下》)《荀子》曰:“闵王毁于五国,桓公劫于鲁庄,无它故焉,非其道而虑之以王也。”(《荀子·王制》)是从王道的角度解释“汶阳之田”。《左传》曰:“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左传·成公八年传》)作为霸主的晋国曾经把汶阳以北的土地赐予鲁国,但却被齐国强占,晋国打败齐国后才还给鲁国,之后晋国为了拉拢齐国,竟然要求鲁国“归诸齐”,《左传》则遵照史实,从“大国制义,以为盟主”“信以行义,义以成命”的角度批判晋国应推行道义、践行诺言,在昭阳看来,这显然比较符合孔子的价值观。

(三)排斥主观臆说

昭阳独尊《左传》,排斥《公羊传》《穀梁传》,《公》《穀》二传注重从政治而非历史的角度阐述《春秋》,借对历史史实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所发议论常常被批驳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⑭因此遭到昭阳的贬斥。昭阳《家学小言》:“《春秋》之义,《左传》与孔门合。不可他求。如《公》《穀》儒家者流言。如胡传无稽臆说。”^⑮他多次批判:“《公》《穀》多小辩”,^⑯“《公羊》《穀梁》齷齪甚”。^⑰在注释《左传》时也经常大发议论,表达对《公》《穀》的批判,他曾说:“《公羊》不合左氏”,^⑱“《公》《穀》家说烦言褒贬,然春秋圣人之制,不如儒说克核大至”。^⑲如《僖公二十六年经》:“公子遂如楚乞师。”《左传》曰:“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公羊传》曰:“公子遂如楚乞师。乞者何?卑辞也。曷为以外内同若辞?”《穀梁传》曰:“公子遂如楚乞师。乞,重辞也。”昭阳认为:“杜注,乞不保得之辞,可谓无用之辨。《公羊》,乞者卑辞也。《穀梁》,乞重辞也。唯左氏无是儒家者流之说,古哉!”^⑳与《公》《穀》相比,《左传》善于从史实本身出发,注重叙

事的客观性。又如《左传·成公十二年传》曰:“周公出奔晋。”昭阳认为:“左氏明确,《公羊》殆穷,《穀梁》不了。”^㉑案,《公羊传》曰:“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传》曰:“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周有人无出。其曰出,上下一见之也。言其上下之道无以存也。上虽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而《左传·成公十二年传》则认为:“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杜预注曰:“天子无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为王所复,而自绝于周,故书‘出’以非之。”杨伯峻认为:“此句说明《经》书‘出奔’之故。《传》意盖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凡从周室外逃,不用‘出’字。而此用‘出’字,乃表示周公楚自己出逃。周王室之臣流亡见于《经》者凡三次,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两次均不书‘出’,唯此次书‘出’……周公为王所复,而自绝于周,故书出以非之。”^㉒《左传》围绕周公楚出奔晋,重在叙述是他自己主动离开王室的,这样解释比《公》《穀》简单明确。在昭阳看来,与《公》《穀》不同,《左传》继承《春秋》的良史精神,注重客观叙述,避免主观臆断,不仅对历史事件做出客观的排比罗列,而且注重对《春秋》历史的解说和补充,同时还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

二、龟井昭阳的《左传》考据学

昭阳处于江户时代后期,深受朱子学、古义学、古文辞学、汉唐注疏学、清代考据学等的影响,他择善而从,继承了江户时期古学派的学术脉络,善于博征典籍,汇集古今注释,同时又充分接触到乾嘉学派的学术成果,而后加以融会贯通,不仅追求详尽,而且还着意于精细的考辨与阐释,体现出了鲜明的考据学特色。

(一)善于博采众说并加以考辨

昭阳参稽群籍,兼采众家,成一家之言,即使竭力批判的《公》《穀》《胡氏传》《孟子》及杜预注等,也积极吸纳其合理的部分。龟井千里认为:“(《左氏》

考》)网络群言,划刘藤葛,摘伏发微,尤多创见。”^②如《桓公三年传》:“成昏于齐也。”昭阳认为:“疏引齐说之,拘矣。”^③案,杜预注曰:“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正义》曰:“此成昏谓聘文姜也。《诗》刺鲁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亲会齐侯,必无媒也。《诗》举正法以刺上,传据实事以解经,故不同耳。”故昭阳认为:“初求之,必由媒介耳,且会而成昏,是非礼也。杜不误。如齐语,桓公若未始由媒,则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愈益剴切矣。”^④鲁桓公与齐僖公在嬴地会见,目的就是成就鲁桓公与文姜“成昏”,这次“成昏”没有媒介,是不符合礼制要求的,杜预注显然是确切的。又如《庄公十七年经》曰:“冬,多麋。”《考义》曰:“《公羊》曰:‘记异也。’未知与杜氏孰胜。”^⑤昭阳认为:“案杜据不为灾不言之例,麋亦泽物也,杜说左氏为确。”^⑥案,杜预注曰:“无传。麋多则害五稼,故以灾书。”又案,《隐公元年传》曰:“有蜚,不为灾,亦不书。”《庄公二十九年传》曰:“凡物,不为灾,不书。”经过排比文献考辨,杜预注依照“不为灾不言之例”,这样的注解显然是比较确切的。昭阳为证实某事、某义之是非正误而广泛搜集材料证据,并加以考辨分析,以求做到信而有征。

昭阳深受荻生徂徕、龟井南冥研究方法的影响,继承并发扬“萱园学派”的学术主张,不仅注重引用《春秋》经传材料,同时还广泛引用同时期的古文、古注,他认为:“左氏不书曲沃代晋之详,盖文献不足故也。”如《桓公二年传》:“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昭阳援引《正义》“旂旗是九旗之总名,可以统大常,故举以为言也”以释其义,同时又援引《穆天子传》《周礼》《礼记》等接近《左传》时期的文献进行参稽、验证与考核,^⑦以求得出合理的结论。

(二)批判性继承杜预注

昭阳继承了清儒、南冥驳正杜预注的做法,认为“《考义》规杜确矣”^⑧“《考义》明矣”,^⑨对杜预注正确的部分加以继承发扬,对其“无明征”^⑩“未妥”^⑪等进

行有力的驳斥。如《宣公三年传》曰:“武氏之谋也。”案,《考义》曰:“言欲谋除武士也,杜注似不得解。”^⑫杜预注曰:“武氏谋奉母弟须及昭公子以作乱,事在文十八年。”《文公十八年传》曰:“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孙师为司城。公子朝卒,使乐吕为司寇,以靖国人。”昭阳认为:“武氏将作乱,故先杀母弟须及昭公子,而后攻武氏,则《考义》优矣,武氏之谋犹谋武氏也。”^⑬此中倡议者为武氏,而穆族实从之,故武、穆之族被逐出,南冥、昭阳的注释显然比杜预注更具合理性。又如《成公十一年传》曰:“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杜预注曰:“正月公在晋,不书,讳见止。”昭阳认为:“三春不归则书正月公在某例也。”并引《襄公二十九年经》《昭公十六年传》后认为“可以征焉”,《襄公二十九年经》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昭公十六年传》曰:“春,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⑭鉴于杜预注存在曲解传文、臆解传文、强解传文等现象,昭阳有力地予以驳正。与此同时,昭阳以批判性继承杜预注为基础,对南冥注、孔颖达疏等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驳。可以说,昭阳不仅是批判者,也是注疏之学的继承者与发展者。

(三)善于贯通全书进行注释

昭阳以“察前后照应,通彼此而洞观之”^⑮作为解读考证《左传》的重要方法,他在《左传纘考》中经常强调“左氏文例不可不参前后而照之”^⑯“左氏之文先后照应”^⑰“左氏之文彼此相照”^⑱“左氏前后照应络脉可谓尽心矣”^⑲“读者亦参合前后而玩其辞”等等。^⑳如《僖公二十二年传》:“不及百年。”昭阳认为:“自平王元年至今百三十三年矣,案伊川之为戎聚既久,今又迁陆浑之戎而来……以是验之,殆不及百年一句,伊川之有戎了然可知,二十四年召穆公亦云,文例可并考,伊洛之戎传既书之于十一年,彼此相照而愈了然。”^㉑案,昭阳善于引用前后文献以印证其说法,如《僖十一年传》曰:“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

京师,入王城,焚东门。”《僖公二十四年传》曰:“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淪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通过对以上材料的比对分析,可知伊、洛先有戎矣。又如《文公元年经》曰:“公即位。”昭阳认为:“未葬而即位,成公定公亦同,襄十六年春葬晋桓公,平公即位,此变礼欤?诸侯虽未葬,既逾年改元则称爵以会,例也。然若大夫有事出使,则当不曰某侯使某,九年及宣十年可并考。”^③案,《文公八年经》曰:“秋,八月,戊申,天王崩。”《文公九年传》曰:“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逾年未葬,不得命臣出使。《宣公十年经》曰:“(夏,四月)己巳,齐侯元卒。(六月)葬齐惠公。冬,齐侯使国佐来聘。”杜预注曰:“既葬成君,故称君命使也。”以上都是他注重察前顾后、彼此照应、注重络脉的典型体现,这也是其基于《左传》长于史实上的考辨和分析。

(四)注重“文例”“义例”等的分析

昭阳善于从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总结,经常以“句法”“义例”“例也”等对《左传》行文规律进行归纳总结,同时其附录《经传大要》对相关“文例”“义例”等有系统梳理与分析。如《文公二年经》曰:“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昭阳认为:“秦大夫将不书,例也,且书战者固当如是。城濮柏举,楚命卿称人亦同,旧说可谓失矣,若书孟明,当曰晋侯及秦,百车视师战于彭卫,春秋无是书法。晋侯先书亦春秋书法也,无不咸然。”^④他同时排列《僖公十八年经》《僖公二十六年经》《僖公二十八年经》《宣公十二年经》《成公二年经》《成公十六年经》《定公四年经》《哀公十一年经》《宣公二年经》《哀公二年经》《文公七年经》《僖公十五年经》诸例以证其普遍规律。他进而总结认为:“书法如列树,或以爵列或以夏夷。”^⑤又如《成公九年传》曰:“晋人执郑伯。”昭阳认为:“诸侯相执必称人,例也,与执大夫无别。归于京师者别有义例。”^⑥如《襄公十六年经》曰:“晋人执莒子、邾子以归。”《襄公十九年经》曰:“晋人执邾子。”《庄公十六年传》曰:“初,晋武公伐夷,执夷诡诸。”而《成公十五

年传》曰:“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杜预注曰:“不称人以执者,曹伯罪不及民。归之京师,礼也。”以上皆是在丰富的文献比对、精细的考证探究基础上总结出的规律。

昭阳对《左传》的考据基于对历代《左传》学之层累阐释过程进行细致的解剖分析,尤其注重对《左传》原初义的运用与辨析,从而形成严谨客观、行文朴实的考据学特点,这在当时颇具代表性。

三、龟井昭阳与江户《左传》学

昭阳所撰《左传纘考》三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博引旁证,爬罗剔剔,洪纤靡遗,蔚成大编”,^⑦突破了徂徕学派学者“以识古文辞为先”的局限,把形成于宽政年间的考据学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他提出了鲜明的经典观与阐释立场,成为江户后期促进考据与阐释相结合的代表。

(一)对《春秋左传考义》的继承与发扬

1784年,南冥任西学甘棠馆的总主持,在他主持推动下的西学盛况远超朱子学为主流的东学,成就了徂徕学的黄金时代。昭阳继承父志,专心教学与著述,探究孔门真谛。从昭阳的经典观与阐释学中可以看出,《左传纘考》较之《春秋左传考义》,注释内容更为丰富,考辨性更强,既重视史实考证,又重视文章阐释的立论分析与结构分析,堪称当时“最为详备”的《左传》注疏本。^⑧

昭阳承袭其父亲“萱园学派”的优良传统,遇到可疑处不轻易下定论,而多批注为“阙疑可也”^⑨“似无优劣”^⑩等,同时又在肯定《考义》“不可改”^⑪“确矣”^⑫等基础上进行拓展与丰富。如《左传·桓公二年传》:“异哉,君之名子也!”昭阳认为:“《考义》确矣。”之后又进一步转引《考义》注释加以阐释,其文曰:“在成师始生,师服温其命名与太子名,并而考之,心深怪其名所以命,出于自然,以此言语人也,其非桓叔长后言之,观语气,可以见已。且太子及成师皆生于姜氏。其初生穆侯,固非有爱憎之心,而其命之名,亦惟自然所使也。故夫人及群下,未尝怪讶之,独师服窃疑其兆乱,能见于所不见者也。杜氏以为

穆侯名二子之日,而已有爱憎之心,不深思哉。是传备记曲沃所由兴,出于自然,因以言师服之明也。”昭阳所阐释之意与《考义》基本一致。他接着认为:“世家晋人师服曰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嫡庶名反逆此说,晋其能毋乱乎,大意与《考义》契合矣。”^⑤其内涵与旨趣明显比《考义》开阔得多。

昭阳继承父亲的遗著,但并不盲从,在征引大量史料并进行精细分析的基础上,对其注疏中的纰漏和讹误之处提出大胆的质疑与驳斥,剖析是非得失。如《庄公七年传》曰:“不害嘉谷也。”昭阳认为:“嘉谷言黍稷稻粱也,《考义》可削。禾大名也,黍稷稻粱菽麻皆曰禾,唯麦无禾称,故曰大无麦禾,幽诗曰禾麻菽麦,既秀曰禾,故无禾则饥也。”^⑥昭阳引《国语·晋语》“子余使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以证之。案,《考义》:“传释苗可改种,不至饥也。庄廿八年曰:‘大无麦禾。’传曰:‘饥。’可并考耳。由是言之,嘉谷言禾,益明。杜谓黍稷,非也。”《吕氏春秋》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吕氏春秋·任地篇》)昭阳从禾与麦对文观点出发,大胆驳斥南冥“嘉谷言禾”的说法。

昭阳继承南冥的研究方法,在详实考据基础上进行阐释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冈村繁认为:“龟井昭阳的学问专长是在考证精博的、原典主义的经学研究上,后汉大儒郑玄的学风学品是他一直追求的理想楷模。”^⑦昭阳不仅继承汉儒谨严的考据之风,还注重义理之辨,同时也善于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文章、字句进行评点考证,有力引领了当时的学术风尚。

(二)对《左传》学研究的影响

作为江户时期《左传》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左传纘考》对后世《左传》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对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的影响最为显著。《左氏会笺·自序》:“予所涉猎,在皇朝则中井氏积德、增岛氏固、太田氏元贞、古贺氏煜、龟井氏昱、安井氏衡、海保氏元备、皆有定说。而龟井氏最完备。”^⑧

《左氏会笺》以“龟井昱曰”的形式援引《纘考》的条目22处,如《成公十五年传》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左氏会笺》注曰:“侯伯会诸侯而讨之,故曰诸侯讨而执之。龟井昱曰:‘此例为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与此经发之也,不归于京师者,是诸侯相执耳,诸侯相执者暴行也,其罪惟均,不得入此例。昭二十三年云若皆相执,焉用盟主。春秋诸侯相执者十见,皆曰某人执某侯,此其义也,执大夫者七、执行人者六,亦尽曰某人,一例也。旧说不详辨传例之法,是以皆穷。’”^⑨《左氏会笺》直接引用了《左传纘考》的观点。《左氏会笺》也常常借用《左传纘考》的见解,甚至“只是将其改头换面一番后便敢矫称为自家学说”,^⑩如《隐公元年传》:“夷不告,故不书。”《左传纘考》注曰:“凡师不告不书之例四出,是传为春秋初年,故先发之,然夷小国也,故十一年重称宋不告,且详示义例,二者皆因见伐者言之,僖九年以伐者言之,至哀元年合客主而言之,备矣。左氏文例,不可不参前后而照之。”^⑪《左氏会笺》注曰:“凡师不告不书之例四出,是传为春秋初年,故先发之,然夷小国也,故十一年重称宋不告,详示义例,二者皆因见伐者言之,僖九年曰:‘令不及鲁,故不书。’以伐者言之,至哀元年^⑫:‘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合客主而言之,其义备矣。左氏文例,不可不参前后而照之。”^⑬比照两个注释,《左氏会笺》基本上就是照搬照抄,连改头换面都没有。

此外,昭阳之后的安井衡(1799-1876)积极继承龟井派的研究方法,并吸纳引用其成果,“缕举众说,互相印证”,^⑭在古文辞学派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在自传中曾说,酷爱《左传》,反复读过11遍,并说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学派一般都是龟井派。^⑮其恩师白石照山亦尤为推崇龟井注疏。^⑯可见龟井派《左传》学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影响之深。

(三)对江户学风的引领

江户时代初期,以林罗山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不仅为德川幕府的长期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

持,而且在官方主导下辐射政治、外交、教育等领域,对江户时代的思想、文化带来强烈冲击,一度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学说。宽政二年,为了独尊朱子学,幕府颁布了禁止异学法令,这样独尊一家的文化政策给日本传统汉学以极大的刺激,首以荻生徂徕为代表,批判宋明理学空谈性理的主张,力主“读书之道,以识古文辞为先”,“古言明而后古义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已”,^④同时在注疏、创作中倡议“尚辞也,主叙事,不喜议论,亦矫宋弊也”。^⑤徂徕学派所征引的古文辞主要是西汉之前以《六经》为主的素材,他认为:“《六经》不仅传达了‘先王之道’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六经》的‘古文辞’即‘先王之道’的表现。”^⑥这是他重视训诂,特别是重视《六经》的意义所在。与此同时,荻生徂徕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古文崇拜之中,“以古言征古义,物氏得之,然其所征,多鲁莽,多牵合固滞,多诬”,^⑦带来了过于拘泥于一端的弊病。

昭阳继承父学,但对《考义》失误之处也进行了大胆批判,这种“不盲从”的特质代表了江户学派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代表了江户一代“龟井派”的学风与文风。昭阳不仅精于材料的分析、驳正、考据,而且还注重贯通全书和篇章结构的考察,这些显然都比南冥对《左传》的注释要精深得多,从而逐步形成了独具龟井派特点的考证方法。因此,冈村繁对此高度评价:“虽说由南冥、昭阳开创的《龟门学》脱胎于荻生徂徕的原典主义学统,但其卓绝出众的学说见识却也足以独成一家。他们对当时朱子学者一味迎合幕府的文教政策,醉心于实践伦理道德教育的倾向十分反感,提倡站在更为学术、自由客观的立场上探究经典古籍的真实旨意,并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⑧

龟井派实证性研究的背后,还蕴含着乾嘉学派对日本的巨大影响。昭阳身处江户后期,德川幕府虽然实行比较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长崎所设立的通商口岸成了汉籍得以源源不断进入日本的重要平台。大庭修对江户时期1714—1855年间的统计表

明:中国入港船只共载书籍6630种,56844部。^⑨从日人野田留浦与余柳桥的笔谈中亦可见一斑,野田留浦写道:“贵邦载籍之多,使用有望洋之叹。是以余可读者读之,不可读者不敢读,故不免夏虫之见者多矣。”余柳桥则答道:“我邦典籍虽富,迩年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贵邦人以国字译之,不患不能尽通也。”^⑩龟井昭阳身处汉籍在日本流通鼎盛之时,遵从乾嘉学派“凡古必真、凡汉皆好”^⑪的学术主张,推崇孔教,遵从圣人之言。在注疏方式上,沿袭乾嘉学派顾炎武、惠惕周、惠栋、洪亮吉等的疑杜、批杜之风,集中批驳其“误说文义”之弊,对杜注确有纠谬补阙之功。他同时继承乾嘉学派搜索群籍、排比文献、反复类推等方法,以求论证的客观公允。当然,龟井昭阳在乾嘉学派的基础上亦有突破之处,一是他贯通全书、彼此照应的注释方法,使得其注解更具有科学性和整体观;二是他没有走入乾嘉学派与社会现实脱离的学术困境,而是表现出了一定的经世致用思想,如《庄公十六年传》对“周庄王、僖王崩葬皆不见于经传”的情况,昭阳认为:“卿士怠慢,百世苟且故也。”^⑫其评点重视总结历史教训,为执政者提供执政之要,故为当时的福泽谕吉所推重。由此可见,昭阳的《左传》学研究是在汉学强势回归、清代考据学兴盛和乾嘉学派盛行于日本学界的大背景下不断发展成熟的,以龟井昭阳为引领,考据和阐释相结合成为《左传》学术研究的主流,江户后期的《左传》学的转型变化由此开始。

总之,昭阳继承了荻生徂徕古文辞学派的学术主张,突破了徂徕学派“以识古文辞为先”,^⑬尤重《六经》的局限。昭阳不仅是徂徕学的积极倡导者,而且对《诗经》《楚辞》《礼记》《论语》《国语》等诸多典籍都有深入研究,把形成于宽政年间的考证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奠定了日本《左传》考据学的基础,但其考据并不拘泥于乾嘉学派,表现出了鲜明的阐释学观点及一定的经世致用思想。龟井派《左传》学是中国传统经典在日本生根落地、茁壮成长的具体展现,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宝贵的素材,这种学中有创的

研究方法使得《左传》在日本的文化语境中折射出异样的风采,进一步促进了日本文化对《左传》的研究、继承与传播,同时也丰富扩充了《左传》的文化内涵、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

注释:

- ①小島憲之、直木孝次郎、西宮一民、臧中進、毛利正守『日本書紀』卷17、小學館編『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小學館、1998年、104-105頁。
- ②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學史』、富山房、1939年、12頁。
- ③龜井千里「左傳續考·序」、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葦書房有限公司、1978年、7頁。
- ④岡村繁:《龜井南冥〈春秋左傳考義〉解說》,見『岡村繁全集』第10卷,俞慰慈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3頁。
- ⑤龜井昭陽「左傳續考·總論」、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8頁。
- ⑥龜井昱『家學小言』、関一郎『日本儒林叢書』、鳳出版、1929年、8頁。
- ⑦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8-9頁。
- ⑧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4、77頁。
- ⑨龜井昭陽『經傳大要』、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4、68頁。
- ⑩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147頁。
- ⑪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456頁。
- ⑫坂本慎一「福沢諭吉と龜井學の思想」、『近代日本研究』第19号、2003年3月、184-185頁。
- ⑬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450頁。
- ⑭何休:《公羊春秋解詁·序》,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190頁。以下引用《春秋》經傳均據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 ⑮龜井昱『家學小言』、関一郎『日本儒林叢書』、8頁。
- ⑯龜井昭陽『左傳續考·總論』、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8頁。
- ⑰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4、5頁。
- ⑱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279頁。
- ⑲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451頁。
- ⑳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270頁。
- ㉑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462頁。
- ㉒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856頁。
- ㉓龜井千里「左傳續考·序」、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8頁。
- ㉔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75頁。
- ㉕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75頁。
- ㉖龜井南冥『春秋左傳考義』、無窮會、1916年、241頁。
- ㉗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155頁。
- ㉘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154頁。
- ㉙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149頁。
- ㉚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155頁。
- ㉛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4、151頁。
- ㉜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169頁。
- ㉝龜井南冥『春秋左傳考義』、278頁。
- ㉞龜井南冥『春秋左傳考義』、278頁。
- ㉟龜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460頁。
- ㊱龜井昭陽『經傳大要』、同全集刊行會『龜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460頁。

全集』卷4,72頁。

③⑦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15頁。

③⑧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282頁。

③⑨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469頁。

④⑩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551頁。

④⑪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457頁。

④⑫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244頁。

④⑬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309頁。

④⑭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312頁。

④⑮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312頁。

④⑯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452頁。

④⑰ 星野世恒『左傳續考・序』、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6-7頁。

④⑱ 坂本慎一「福沢諭吉と亀井学の思想」、『近代日本研究』第19号、2003年3月、184-185頁。

④⑲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230頁。

⑤⑩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4,7頁。

⑤⑪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4,5頁。

⑤⑫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4,8頁。

⑤⑬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71頁。

⑤⑭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136頁。

⑤⑮ 岡村繁:《亀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解说》,见《冈村繁全集》第10卷,第173頁。

⑤⑯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4頁。

⑤⑰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第1076頁。

⑤⑱ 岡村繁:《亀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解说》,见《冈村繁全集》第10卷,第177頁。

⑤⑲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15頁。

⑥⑩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第35頁。

⑥⑪ 服部宇之吉『汉文大系』卷21、富山房、1916年、11頁。

⑥⑫ 福泽諭吉:《福泽諭吉自传》,马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頁。

⑥⑬ 张建国『福沢諭吉と儒学を結ぶもの』、日本僑報社、1998年、60頁。

⑥⑭ 荻生徂徠『论语微』、『荻生徂徠全集』卷4、みすず書房、1978年、4頁。

⑥⑮ 丸山真男校注『荻生徂徠』、岩波書店編『日本思想大系』卷36、岩波書店、1973年、23頁。

⑥⑯ 丸山真男校注『荻生徂徠』、岩波書店編『日本思想大系』卷36、632頁。

⑥⑰ 亀井昱『家学小言』、関一郎『日本儒林叢書』、6頁。

⑥⑱ 岡村繁:《亀井南冥、昭陽の学問——值其著述全集刊行之际》,见《冈村繁全集》第10卷,第462-463頁。

⑥⑲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舎、1984年、52頁。

⑦⑩ 田中谦二、松浦章編『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得泰船资料』、関西大学出版部、1986年、504頁。

⑦⑪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6頁。

⑦⑫ 亀井昭陽『左傳續考』、同全集刊行会『亀井南冥・昭陽全集』卷3,154頁。

⑦⑬ 丸山真男校注『荻生徂徠』、岩波書店編『日本思想大系』卷36、251頁。